

【“我眼中的粤港澳大湾区”主题征文】



秋在别处

□何梦麟

秋天大约总是从风开始的。只是这里的风,像一句含在嘴里太久、终于被迟疑着吐出的耳语。你得静下整个身子来等,等白日最后一点溽热从水泥地底散尽,等霓虹初上,市声暂歇的那一隙空白,风从不知名的巷口拐出来,带着一点微腥的、水汽洗过的凉意。那不是故乡那种干爽的,带着草屑与尘土气息的秋风;这里的风,拂过之后,总在皮肤上留下一点看不见的、黏的痕迹,像南国温存而固执的挽留。

我意识到,我在寻找一种清晰的界限。故乡的秋,仿佛一夜之间,天空被“唰”地抽高,显出那种凛冽的、水洗过似的青瓷色;满树的叶子,不是慢慢转黄,而是在某个霜晨,集体发出哗然的、金箔般的呐喊。

广州却是满目的绿色。这里的绿,沉默而坚韧。榕树垂着它数不清的气根,像老人未理清的纷繁思绪,在风里也只是懒懒地晃,一副地久天长的样子。木棉以一种钢筋铁骨的姿态指向天空,并不诉说凋零,只预告着来年另一种惊心动魄的燃烧。时间在这里,仿佛陷入了一场温暖的、循环的瞌睡,它流转,却拒绝留下鲜明的刻痕。

我的寻找,便成了一种对空谷的喊话。直到某个傍晚,我路过一栋正在拆除的老楼。墙体倒坍了大半,露出里面一格一格曾经的家。夕阳从楼宇的缺口射进来,给残存的楼梯镀上一层恍惚的金色。老人坐在瓦砾堆旁的小凳上,静静地望着那一片废墟。他身后,一株野生的木瓜树,正挂着几枚沉甸甸的青

果。风又起了,这次卷着尘土和遥远年代的气息,吹动他花白的头发。他没有动,只是眯着眼。那一刻,没有黄叶飘零,没有雁阵南飞,我却忽然被一种浩大的秋意击中了。

秋意不在物象之中,在凝视的目光里,在“曾存在”与“正消失”的静默对峙里。

原来,秋不一定需要满天枯叶来证明。它是一种内化的时间感知,是一种在蓬勃的、流动的生机之下,对静止与消逝的突然领悟。这片南国的土地,只是将秋天折叠进了更深的层次:藏在骑楼缝隙间一抹苍老的枯荣里;藏在珠江水流那永不止息却已然变换了的温度里;也藏在每一个异乡人午夜梦回时,心头那一片突然降临的、与周遭喧腾格格不入的旷野里。

我便不再刻意寻找那种斩钉截铁的秋了,开始懂得欣赏这暧昧的、过渡的、藕断丝连的时节。清晨那股风,依旧清淡;午后的阳光,也还留有夏末的余温。但当我把手伸进阳光里,似乎能感觉到光线本身质地的那一点不同了,它不再那么炽烈地想要灼伤你,而是带着一种沉思般的、抚慰的重量。

或许,每个人的生命里,都有一个“异乡的秋”。它只存在于你与周遭世界那一点微妙的、难以言喻的“时差”里。风终于有点凉了。我关上半扇窗,留下一半,让那濡湿的夜气,继续流进来。我知道,我的秋不在窗外,也不在遥远的北方。它在这寻找与领悟的途中,在我与这片终不肯彻底萧索的土地,所达成的那份沉默的、惆怅的谅解里。

荔湾药材香

□黄守昱

搭地铁从黄沙站F出口出来,沿着河涌行走在六二三路,还未过桥见到沙面岛上的西洋建筑,先闻见一阵甘苦香。一排骑楼向道路跨出,外廊遮挡下是一间间药材铺,层层货架,满目琳琅。药材边的红纸黑字上一一对应标注着:田七、熟地、当归、党参、川贝、天麻、北芪、铁皮石斛……条条颤颤,分别堆在一座座巨大的透明塑料袋里,丰盛得像无数个谷仓。店铺里最显赫的药材,如车轮般的灵芝、根系庞大的人参,会被放在店显眼的位置,如同一尊尊神像不动如山。精明的店主们坐在门口,一边刷着手机,一边打量经过的人,看似慵怠,其实目光如炬,随时能发现潜在的顾客。

年幼时生病,家里也煲中药,依照的是老中医面诊开的方子。各色药材从纸包拆出,被投入瓷煲之中;用瓷碗从水龙头接清水,满满当当,口中一边念着医嘱:三碗水煮成一碗水。水声沉煲,盖上厚厚的砂锅盖,有盖棺定论的意味,这碗药是非喝不可了。

水咕噜的声音在煲中闷闷的。病痛中的我,耳力倒是清明。黑魆魆的药汤还没端到眼前,我就已经恐惧,索要一口冬瓜丁或陈皮佐药。大人们会威胁:“乖乖喝,就要抓你灌药了。”我只好屏住呼吸,捏住鼻子,一口气喝下,那是一种多么酸苦难闻的气味。

如今闻到浓郁的中药材味,只觉得香。

珠江晨光

□刘又青

晨光掠过珠江的水波,映着港珠澳大桥的桥身。在羊城吃一碗肠粉和艇仔粥,写下氤氲的青春诗。每个词,都染着西关屋檐的彩,香气飘向市井老巷。

还记得荔枝湾畔的裙裾,海心沙桥头,你的微笑。五线谱的浪花掀起帆风,天空如此蔚蓝。你听,珠江的潮汐与时代共鸣,广深高铁穿过隧道,带着你的消息。我们将爱种进大湾区沸腾的土壤。

清风唤醒地铁,送我们到安身立命的地方。增城晚稻飘香,南沙海风习习,花都的红棉静静绽放。广厦摩云,花城如画。

望着珠江新城的三角梅,过往的悲欢被珠江水淘洗。因为爱或改变,冬来临,依然感到城市的温暖。每一刻,都有我永不忘却的痕迹。

第一个敢吃螃蟹的是岭南人,有过犹豫,但使命召唤我们。走进历史,诉说五羊雕像的传说,车轮驶向远方,我们奔向更耀眼的星辰。



肖像(绢本)

□叶华

第一声轰鸣

□唐承斌

穿梭的轮船上。那些船只,要依靠庞大笨拙的蒸汽机航行;而遥远的西方,已悄然进入更高效的柴油机时代。

柴油机长什么模样?它如何将黑乎乎的柴油,转化为推动钢铁巨轮前行的磅礴力量?对于陈拔廷他们来说,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,一道亟待开启的大门。

历史的发端,往往朴素得近乎寒酸。1911年,陈拔廷、陈沛霖、何渭文等人,在大涌口租了几间敞篷屋,挂出“协同和”的招牌。喊出了“协力同心,和衷共济”的口号。他们起步的家当简单得可怜:一台煤气机、一套碾米工具。没有人能想到,中国工业史上若干个重要的齿轮,即将在这个飘着米糠和铁屑的简陋车间里,开始缓慢而坚定地转动。

协同和从碾米和修理碾米机起步。那时的中国,机器设备几乎全靠进口,最先进的碾米机来自美国和德国。在日复一日的操作中,陈拔廷和陈沛霖敏锐地察觉到了进口碾米机的缺陷,一种不服输的念头悄然滋生: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呢?于是,他们结合美、德机型的长处,设法克服各自的弱点,改良出性能更优的“米磨二号”。当改良后的机器碾出更白更匀的米粒时,客户从四面八方涌来,产品远销东南亚。

初战告捷的协同和没有安于现状,他们深知振兴民族工业的重要性。碾米机扬起的粉尘尚未落定,他们的目光已越过厂房,投到珠江往来

声音,提出一个近乎直觉的猜想:“会不会是车叶太大了?”

那一瞬间,如拨云见日。他们连夜修改车叶尺寸,重新安装。再次启动时,那恼人的震动,竟奇迹般地减弱了。接着是转速、供油、点火的反复调试……终于,轮船再次启航。这一次,柴油机发出的不再是痛苦的嘶吼,而是一种均匀、浑厚、充满力量的轰鸣。它带着轮船划开江面,留下一道平稳而自信的航迹。

那是1915年。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柴油机,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。这声音,是中国现代动力设备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啼哭,也是一个民族工业觉醒的初鸣。

自此,协同和便如一叶扁舟,跟随国家命运,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颠簸前行。1938年广州沦陷,工厂被日寇铁蹄践踏,机器被抢掠一空,那曾经响彻珠江的轰鸣,只剩下废墟间的呜咽。抗战胜利后,它在满目疮痍中艰难复苏,如同在灰烬中寻找残存的火种。直到新中国的曙光降临,它成为广州最早公私合营的企业之一,并于1966年更名为广州柴油机厂。

百年风雨,几度浮沉,协同和的拼搏精神从未断裂。它从珠江边的简陋棚屋出发,最终将声音融入浩瀚的大海。这声音见证的,不仅是一部机器的诞生,更是一个古老国度在工业文明洗礼中,从观摩到创造、从自强到自信的深沉觉醒。那最初的轰鸣,不是历史的余音,而是催人奋进的号角。

清晨,巷子里的烟圈和响动

□王瑛

他吐出的烟圈,开始是圆形。他走远了,烟圈在他身后面变成椭圆形,然后消失。

“来卢屋村的时候,我是有工作的,在巷子里扫地。村里有规定,六十岁不让干了,这十年,就在村里捡垃圾卖。”王大哥说。

王大哥住在五巷4号,我住在五巷5号。那时,我在新湾做老师,王大哥出门、回来,都要从我窗口过。他的白色衬衫上没有污迹,很注意时间,时不时盯着手腕上的银色手表。看不出来他是捡垃圾的。

一大早,叶子烟的清香味跑过我的窗户,6点,我准备起床去上班。

每天,王大哥扛着黄色蛇皮口袋,从我窗户下走过。他走出巷子,叶子烟的烟雾在他身后打圈圈。我想起自己的父亲,这是我迷恋了一个童年的气味。

在巷子里待久了,烟的气味有一种吸引力,引导我怀念一片泥土里长出来的草叶子,新鲜、水滴滴的,阳光爬在叶片上,我想象王大哥吸的就是那片叶子上的绿色。

在巷子里,大家不会和一个捡垃圾的人说话。上班的人赶着上班,不会理睬一个捡垃圾的人;女人低头剪线头,没工夫和一个捡垃圾的人打招呼……

我想,一个人在人群里,长时间没有和人说话,就像生活在黑夜里,被黑夜浸泡久了,就适应了黑夜的黑。我很多次与王大哥擦肩而过,招呼他,他没有反应,这些声音,不在他的世界里。

王大哥总扛着半袋子东西回来,嘴里“吧嗒——吧嗒”地吸着烟。不快不慢,做着自己的事情。

巷子里还有一位姓黄的南充人,大家叫她黄大姐。她个子矮小,说一口“川普”。三十年前,黄大姐两夫妇一起来到卢屋村,租了一间房子,铺一张床,放一些搞卫生的工具,就把房间塞满了。

黄大姐有两个儿子,一个十二岁,一个十岁,放在老家,请婆婆照顾。黄大姐在卢屋村的西巷与北巷交接处扫地。她见人就打招呼,“老乡回来啦?老乡吃饭没有……”她把别人都当“老乡”。

黄大姐见人就熟,对人亲热,与她聊三两句,她就黏住你了。

冬天没有天亮,黄大姐带着“哗——哗——”的声音移动,像涨潮时村口河流的声音。它在一巷响起,在二巷消失,在拐弯的地方连接上,拐到另外一个巷子去了。

清晨扫地,垃圾运走了,她就有更多时间与别人打招呼,与别人聊天。

有一次,她从老家回来,我见她眼睛发红,她拉我到巷子后面说:“大娘儿不争气,离婚了,小猴儿做生意亏了二十万,把我的户口本偷出去把房子卖了。这次回去,找到派出所,把房子收回来了。大年三十那天,伯娘请我团年,我没得脸见人,放了三百块钱在她的枕头下,没有打招呼,我就回来了。”我望着黄大姐,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

她扫地的声音,5点在东巷响动起来,在西巷收回。

再次听到这种响动,已是第二天的早晨了。